

中国文库

· 文学类 ·

七月派作品选

(下)

吴子敏 编选



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文学出版社

萧 红

失 眠 之 夜

为什么要这样失眠呢！烦躁，呕心，心跳，胆小，并且想要哭泣。

我想想，也许就是故乡的思虑罢。

窗子外面的天空高远了，和白棉一样绵软的云彩低近了，吹来的风好像带着点草原的气味，这就是说已经是秋天了。

在家乡那边，秋天最可爱：

蓝天，蓝得有点发黑，白云就像银子做成的一样，就像白色的大花朵似的缀在天上，就又像沉重得快要脱离开天空而坠了下来似的，而那天空就越显得高了，高得再没有那么高的。

昨天，我到朋友们的地方去走了一遭，听来了好多的心愿——那许多心愿综合起来，又都是一个心愿——这回若真的打回满洲去，有的说：煮一锅高粱米粥喝，有的说，咱家那地豆多么大！说着就用手比量着；这么大，碗大，珍珠米，老的一煮就开了花的，一尺来长的，还有的说：高粱米粥，咸盐豆。还有的说，若真的打回满洲去，三天三夜不吃饭，打着大旗往家跑。跑到家去自然也免不了先吃高粱米粥或咸盐豆。

比方，高粱米那东西，平常我就不愿意吃，很硬，有点发涩，（也许因为我有胃病的关系，）可是经他们这一说，也觉得非吃不可了。

但什么时候吃呢？那我就知道了。而况我到底是不怎样热

烈的，所以关于这一方面，我终究是不怎样亲切。

但我想我们那门前的高草，我想我们那后园里开着的茄子的紫色的小花，黄瓜爬上了架。而那清早，朝阳带着露珠一齐来了！

我一说到高草或是黄瓜，三郎就向我摆手和摇头：“不，我们家，门前是两棵柳树，树荫交结着做成个门形，再前面是菜园，过了菜园就是山，那金字塔形的山峰。正向着我们家的门口，而两边像蝙蝠的翅膀似的向着村子的东方和西方伸展开去，而后园：黄瓜，茄子也种着，最好看的是牵牛花在石头墙的缝际爬遍了，早晨带着露水牵牛花开了……”

“我们家就不这样，没有高山，也没有柳树……只有……”我常常就这样打断他。

有时候，他也不等我说完，他就接下去，我们讲的故事彼此都好像是讲给自己听，而不是为着对方。

只有那么一天：买来了一张《东北富源图》挂在墙上了，染着黄色的平原上站着小马，小羊，还有骆驼，还有牵着骆驼的小人；海上就是些小鱼，大鱼，黄色的鱼，红色的好像小瓶似的大肚的鱼，还有黑色的大鲸鱼；而兴安岭和辽宁一带画着许多和海涛似的绿色的山脉。

他的家就在离着渤海边不远的山脉中。他的指甲在山脉上爬着：“这是大凌河……这是小凌河……哼……没有，这地图是个不完全的，是个略图……”

“好哇！天天说凌河，那儿有凌河呢！”我不知为什么一提到家乡，常常愿意给他扫兴一点。

“你不相信！我给你看。”他去翻他的书橱去了：“这不是么！大凌河……小凌河……小孩的时候在凌河沿上捉小鱼，拿到山上去，在石头片上用火烤着吃……这边就是沈家台，离我们家二里路……”因为是把地图摊在地板上看的原因，一面说着，他一面用手

扫着他已经垂在前额的发梢。

《东北富源图》就挂在床头，所以第二天早晨，我一张开了眼睛，他就抓住了我的手：

“我想将来我回家的时候，先买两匹驴，一匹你骑着，一匹我骑着……先到我姑姑家，再到我姐姐家……顺便也许看看我舅舅去……我姐姐很爱我……她出嫁以后，每回来一次临走的时候就哭一次，姐姐也哭，我也哭……这有七八年不见了！也都老了。”

那地图上的小鱼，红的黑的，都能够看清，我一边看着，一边听着，这一次我没有打断他，或给他扫一点兴。

“买黑色的驴，挂着铃子，走起来……刚唧唧唧唧……”他形容着声音的时候就像他的嘴里边含着铃子似的在响。

“我带你到沈家台去赶集。那赶集的日子，热闹！驴身上挂着烧酒瓶……我们那边，羊肉非常便宜……羊肉炖片粉……真是味道！唉呀！这有多少年没吃那羊肉啦！”他的眉毛和额头上起着很多皱纹。

我在大镜子里边看到了他，他的手从我的手上抽回去，放在他自己的胸上，而后又反背着放在枕头下面去，但很快的又抽出来。只理一理自己的发梢又放在枕头上面去。

而我呢？我想：

“你们家对于外来的所谓‘媳妇’也一样吗？”我想着就这样说了。

这失眠大概也许不是因为这个。但买驴子的买驴子；吃咸盐豆的吃咸盐豆；而我呢？坐在驴子上，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我停留着的仍然是别人的家乡。

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甚切，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虽然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

这失眠一直继续到黎明，在黎明之前，在高射炮的声中，我也

听到了一声声和家乡一样的震抖在原野上的鸡鸣。

八月廿二日夜

(选自《七月》上海版二期，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
出版。)

无 题

早晨一起来我就晓得我是住在湖边上了。

我对于这在雨天里的湖的感觉，虽然生疏，但并不像南方的朋友们到了北方，对于北方的风沙的迷漫，空气的干燥，大地的旷荡所起的那么不可动摇的厌恶和恐惧。由之于厌恶和恐惧，他们对于北方反而讴歌起来了。

沙土迷了他们的眼睛的时候，他们说：“伟大的风沙啊！”黄河地带的土层遮漫了他们的视野的时候，他们说那是无边的使他们不能相信那也是大地。迎着风走去，大风塞住他们的呼吸的时候，他们说：“这……这……这……”他们说不出来了，北方对于他们的讴歌也伟大到不能够容许了。

但，风一停住，他们的眼睛能够睁开的时候，他们仍旧是看，而嘴也就仍旧是说。

有一次我忽然感到是被侮辱着了，那位一路上对大风讴歌的朋友一边擦着被风沙伤痛了的眼睛一边问着我：

“你们家乡那边就终年这样？”

“那里！那里！我们那边冬天是白雪，夏天是云，雨，蓝天和绿树……只是春天有几次大风，因为大风是季节的征候，所以人们也爱它。”是往山西去的路上，我就指着火车外边所有的黄土层：“这在我们家乡那边都是平原，夏天是青的，冬天是白的，春天大

地被太阳蒸发着，好像冒着烟一样从冬天活过来了。而秋天收割。”

而我看他似乎不很注意听的样子。

“东北还有不被采伐的煤矿，还有大森林……所以日本人……”

“唔！唔！”他完全没有注意听，他的拜佩完全是对着风沙和黄土。

我想这对于北方的讴歌就像对于原始的大兽的讴歌一样。

在西安和八路军残废兵是同院住着，所以朝夕所看到的都是他们，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残废的女兵。我就向别人问：

“也是战斗员吗？”

那回答我的人也非常含混，他说也许是战斗员，也许是女救护员，也说不定。

等我再看那腋下支着两根木棍，同时摆荡着一只空裤管的女人的时候，但是看不见了，她被一堵墙遮没住，留给我的只是那两根使她每走一步那两肩不得安宁的新从木匠手里制作出来的白白的木棍。

我面向着日本帝国主义，我要讴歌了！就像南方的朋友们去到了北方，对于那终年走在风沙里的瘦驴子，由于同情而要讴歌她了。

但这只是一刻的心情，对于蛮的东西所遗留下来的痕迹，憎恶在我是会破坏了我的艺术的心意的。

那女兵将来也要作母亲的，孩子若问她：

“妈妈为什么你少了一条腿呢？”

妈妈回答是日本帝国主义给切断的。

成为一个母亲，当孩子指问到她的残缺点的时候，无论这残缺是光荣过，还是耻辱过，对于作母亲的都一齐会成为灼伤的。

被合理所影响的事物，人们认为是没有力量的——弱的——或者也就被说成生命力已经被损害了的——所谓生命力不强

的——比方屠介涅夫，在作家里面，人们一提到他：好是好的，但，但……但怎么样呢？我就看到过很多对屠介涅夫摇头的人。这摇头是为什么呢？不能无所因。久了，同时也因为我对摇头的人过于捉摸的缘故，默默中也感到了，并且在我的灵感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也就无恐惧起来，我就替摇头者们嚷着说：

“他的生命力不强！”

屠介涅夫是合理的，幽美的，宁静的，正路的，他是从灵魂而后走到本能的作家。和他走同一道路的还有法国的罗曼罗兰。

别的作家们他们则不同，他们暴乱，邪狂，破碎，他们是先从本能出发——或者一切从本能出发——而后走到灵魂。有慢慢走到了灵魂的，也有永久走不到灵魂的。那永久走不到灵魂的，他就永久站在他的本能上喊着：

“我的生命力强啊！我的生命力强啊！”

但不要听错了，这可并不是他自己对于自己的惋惜，一方面是在骄傲着生命力弱的，另一面是在招呼那些尚在向灵魂出发的在半途上感到吃力正停在树荫下冒汗的朋友们。

听他这一招呼，可见生命强也是孤独的。于是我这佩服之感也就不完整了。

偏偏给我看到的生命力顶强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人家都说日本帝国主义野蛮，是兽类，是爬虫类，是没有血液的东西。完全荒毛的呀！

所以这南方湖上的风景，看起来是比北方的风沙愉快的。

同时那位南方的朋友对于北方的讴歌，我也并不是讽刺他。去把捉完全隔离的东西，不管谁，大概都要被吓住的。我对南方的鉴赏，因为我已经住了几年的缘故，初来到南方也是不可能。

一九三八，五，十五。

（选自《七月》十四期，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六日出版。）

曹 白

这里，生命也在呼吸……

战争既然开始，一天到晚坐在屋子里听炮声，爬到屋顶上看飞机，虽说也算得“战时生活”，但总不是办法。首先使我想到的，是应该着着实实的做些事情的时候了。但这又并不是说我自己要上火线上去拿枪杆。枪杆，我是不会拿的。我所能做的事，大抵只能在后方。

然而这也难。我东奔西走，入会，开会，提议，讨论了好多天，毫无结果——什么事情也没有。后来忽然听到一句“谣言”了，那仿佛隐然的说：“救国无门呀！”于是我这才觉悟，在后方，并不是没有事情，恐怕是在事情的周围造了高墙了。

但这种觉悟了的味道，是苦的。

有一天的黄昏，偶然遇见了浓眉毛的 H，他瞪着眼，对我描述了平时只会手拿佛珠，口念弥陀的和尚们，这回却戴着笠帽到火线上去救护伤兵的勇敢的故事之后，他说起有一个慈善机关正在救济难民，开办难民收容所，可惜没有人去帮他们的忙。我倾听之下，很欣喜，就马上决定了：

“我去！”

一去就是办登记。——我拿了铅笔和登记表格，去进难民丛中去，第一个我登记的是一个老头儿：

“老伯伯，你叫什么呀？”

“我的家住在杨树浦，先生。”

“不是，我问你，你名子叫的什么呀？”

“噢，噢，问我的名子吗？我的名子，叫阿二。”

“姓数呢？”

“姓王——三划王。”

“你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吗？我是三十六岁到上海的，先在偷鸡桥摆一个小摊，后来摆小摊是，也难，咳咳，也难过。到四十岁上，我的儿子也到上海来了，诺，就是这个，他叫福郎……”

“你的儿子的名头，我也要写的。现在你只要告诉我：你今年几岁了？”

“噢噢，我今年五十一岁了，属猪。”

“你是那里人呢？”

“南京。”

“南京吗？听你的口音，有点像泰兴的呢？”

“不，我不是泰兴——我不是江北人！先生，你若是不信，随便去问那一个去！江北人是黑良心的呀——我的的确确是南京人！不是江北的！”

“不是的，老伯伯，这不打紧的，你那里人就说那里人，不要做假。”

“噯噯，先生真是，我还要做什么假呢，反正到了如此的地步了！”

“那么，你是做的什么生意呢？”

“到上海，先摆一个小摊，在偷鸡桥。后来福郎来，他的娘舅是好心肠，他把福郎荐进芋荷去，织绉纡……”

“你儿子在怡和厂的吗？”

“是，是在芋荷。是大英的。我就去烧饭，福郎的娘在上次‘一二八’，被东洋人一个炸弹，她——”

“那末，我问你，老伯伯你家——”

“我家就在杨树浦××里十二号，你若是不信，随便去问那一个去。这回我和福郎，要是不逃得快，先生，真是，也要和福郎娘的一样了……”

“老伯伯，不要着急，我们打了胜仗了。”

“谁着急呢？打了胜仗了吗？打到杨树浦了吗？”

“打到杨树浦了。汇山码头也夺回来了。”

“好好！”

然而不好。因我们的收容所是设在电影院里的。电影院的建造，本来只为了享乐的人们，并非为了受难的百姓。那首先第一的缺点，就是窗牖的稀少。能容二千左右观客的这么一个巨大的电影院，还只收了四百多个难民呢，就觉得窒息不堪了。天又热，而难民们在逃亡之际，总想多带一点自己的财产，所以有许多箱笼包裹，并且有些人还驮着棉衣或夹袄，情愿脸上挂着一条一条的汗流。可是，这样一来，汗臭霉臭，便充满了一屋子。

再加呢——说起来，真要使语堂先生大笑不止的，就是这些难民大抵是粗人，没有出过洋，用不来抽水马桶；有的竟至于一面抽水，一面撒污，水污交进，溅满了一屁股。所以两间厕所，不到半点钟，就一塌糊涂，变成马厩那样了。于是在汗臭霉臭之中，加以骚气，充满了一屋子。

事情既然到了这般地步，我就在难民中选出几个人，组织清洁队，教授“抽水马桶使用法”，把厕所洗刷了一番。然而虽然这样，到底还使有些调查的委员，“慰劳”的摩登女郎们，掩鼻而过，或者戴上卫生口罩来。

难民的每天的粮食，是我们上司发下的，发下的是饭。一日两顿，每人每顿吃一斤——十六两。据我的经验，他们要比囚犯吃的少三两。但能够弄到饭吃毕竟要算上上了，有的地方，只喝两顿稀

饭哩。——也要过日子！

但那电影院的业主们确是使我讨厌的。单以电灯而论，他就只给难民开了五十支光的两盏，可是他却偏偏横说自己是“牺牲”了，竖说自己是“牺牲”了。有一位还竟至于每见我时，总爱偏着头，斜耸着肩胛，直着眼，像一匹傲悍的公鸡。对于难民，他是开口猪猡，闭口猪猡的，以显出他是高踞“猪猡”之上的大人物。

大概真是“猪”之故吧，有一个难民收容所，被解散了，浓眉的H还几乎被带到“局”里去，但H是平安的。而那些被骗的难民，大部分又向南火车站逃去了，然而，呜呼，当夜就来了一群日本的飞机，将他们跟别的一起，炸得无影无踪了。我想，其中谁是幸免于“难”的？——谁知道呢！

此之谓“难民”。

但自己的收容所里的难民，也委实会出“难”题目。他们自动集合了二十多个人，全是青年，连王福郎在内，一致要求我代他们设法到前线去，那理由是：

“我们在这里光是吃吃睡睡，无聊，我们愿意上火线，扛子弹，掘壕沟……枪不会放，力气是有的。”

我是明知道自己没有“代他们设法”的能力的，但为了不使他们失望，也就只好连连点头，答应了他们。

但是当天的黄昏，王福郎却扯着我的衣角，嘴巴附在我的耳旁，低低地说道：

“先生，你不要告诉我的爹，说我是要去上火线去的啊！”

夜晚，我在守夜。

电影院业主们所赐给这四百多个难民的两盏电灯，放着惨淡的光彩，这巨大的建筑物，就显得异样的幽暗和昏沉。难民呢，他们大抵摆脱了白天的焦灼和哀愁，渐次入梦了。

我寂寞的环视了这灰暗的戏院，难民的鼾声起来了。在鼾声的相互的拍击中，我发现一支毛竹的扁担，竖在一只坐椅的背后，走进去看时，我才知道，这扁担是王阿二家的，福郎为了睡觉的舒服，一只手还贴紧了扁担的下端，然而那扁担的上端却已开裂了。

我在睡着了了的难民的中间，来回的走着，小心翼翼的，惟恐惊醒了他们，偶一回头，就看见福郎的扁担，在整然的坐椅中间矗立着，因为灯光的衰微，它显得格外的粗大，宛如一支倔强的铁铸的臂膊。

十二点的半夜过后，黄浦江中的日本军舰上的大炮，又在隆隆的轰鸣了。我忽然这样想，“也许，我就会变成难民的吧。”但我听得格外清楚的，却是围绕在我身边的四百多条生命的强烈的呼吸。

九月三日夜。

（选自《七月》上海版第一期，一九三七年九月
十一日出版。）

杨 可 中

上海既然沦陷，战线便逐渐远离了。这也好，凝结在半天里的烧了半月大火的南市的灰红的烟云，那像出炉的铁的，再不会来烫灼我的心了。这几天来，物价的平稳固然不必说，即来来往往的行人，也不像从前似的紧张，逐渐开始熙攘了。只要听不到大炮，看不见飞机，人在这中间，是很容易苟安下去的。

“是很容易苟安下去的吗？”但是，我的心头又是那样的沉重。……我想，无论如何，至少，为了可中，是应该写下一点的了。

可中很年青，但我和他相识的日子，是那一天呢？已经一点不

记得了。总之,大概就是上海沦陷的左右吧,但我也记不得是白天还是在晚上。总之,力立跑了来,只说,他有四个朋友上了人家的大当,从别动队里退下来了,没有吃,没有住,想作为难民,叫我收进自己的收容所。

这在我,真是所谓“无有不可”的。便一口答应了。

其实我正忙。马路上的行人都心酸的看着租界外面的那几乎要冲破天空的腾腾的乌烟,在想念着那烟底下多少田园,多少庄稼,多少性命,多少牲口,被毁灭了,被烧死了,被杀戮了……“月黑杀人夜”,即便是在白天的租界上罢,也充满了屠杀的恐怖的。人心惶惶,难民的行列是扩大了。但为了自己的事物,不得不拨开恐怖,在火药气里仍然的逗着,忙着,奔波着,把收容所里经常繁琐的工作,都放到了别的同事们的肩上,以致力立的从别动队里退下来的那四个朋友何时入所,我竟茫无所知了。

有一天,我到儿童室去了,但一跨进门,便非常的不满。首先,被褥是应该折叠的整整齐齐的,但在右角落里的三四条,却任意的摊着,还有一把胡琴躺在被窝上。其次,枕边就有许多香烟灰,那显然是曾经偷吸过香烟的,犯了我们收容所里的第一条规则。我心里很不高兴了:“谁在这里睡的呀。像狗窝那么样。”我愤愤的说。

查问的结果,才知道原来就是力立介绍进来的那四个。

“人呢?”我又愤愤的问。

“都出去了哩!”

吃中午饭的时候,他们回来了。我这才留心看见,他们的头发都长得要命,似乎两三个月没有剃过头,那几天气候转冷了,身上的衣服显然不很够,然而我毫不原谅,只觉得他们扰乱所内的规则,毁坏了我心里的整然的信念,而且从来不折被褥,偷吸香烟,长

头发等等的许多事实考证起来，断定他们是我“疾首痛心”的艺术家，所谓浪漫蒂克的。

而我的恶意的推考也到底没有错，果然，他们全都会演戏，其中两个还会画，而画得最好的一个便是杨可中。

他们在收容所里很演了几出戏，可中还代我们画了十月革命纪念日的报头和插画。然而可中的脸是阴冷的，仿佛是深冬的严寒的冰块。眼皮是单的，年纪轻轻，胡须却很长，总爱朝着别人傲岸的看，尤其是对着我，我想，“你有什么了不得呢！”

但总之，我和他们，尤其是可中，终于很隔膜，这样的有一个多月过去了。其时苏州、无锡，也相继上海而沦陷。

可是我又“奉命”去接另一个规模较大的收容所，需要许多的人。本来，上海的人多着，但都相继“逃之夭夭”了。到哪里去找呢？无法。我逼着力立同我配备一批人。

第二天，力立对我说，人齐了。只是他叫杨可中负责全部教育的工作。我颇不以为然。我想，“他有什么了不得呢？”但事如火急，也只好迁就一点了。

我一天到晚仍然莫明其妙的忙着。但在事务的关系上，可中是和我接近了的。他的脸像天生的冰块，阴冷依然。笑影当然少，同我说话，总是不满三四句，就沉默下去了。但他却曾对我表示过，因为自己是北方人，同难民说话，两边都不懂，是感到很大的苦恼的。

“那么慢慢来罢。不要性急。”我说。

“嗯。”他朝我看看，立刻沉默，随即顺下了眼去。

可中的勤奋的工作出乎我的意外，横在我胸中的对他的不融洽也逐渐消除，而且互相接近了。

天气也逐渐的冷下来，而可中身上的衣服依然只有这么些。在很深的黄昏，他伏在桌子上，哆嗦着手用心的写钢板。我只要看见他在深夜还在工作的时候，便感到自己身上的温暖。虽说自己身上的衣服也是别人送我的，然而，立在可中的面前，我总觉得难受而抱歉。在这种感情起来的时候，我便想到了家庭和朋友。

“我的家是已经成了战区了，你的呢？”我说。

“咄，不要提起它吧——老早被占据了——这也好，一家口子同我都不对。”

“为什么的呀？”我不免惊异的问。

“不要提起罢，咄——‘不对’是‘不对’就是了。”到这里，他便不再往下说。

“那么，朋友呢？”

“很多。——但现在很少了。都是穷的。和我们一样，一样。嘻嘻。”他冰冷的一笑，又马上收住了。

但据熟悉可中的身世的人告诉我，他的家庭并不穷，哥哥是公安局长，父亲还在做另外的更高的官。但不知怎的，他叫乡下人起来抗捐，省里从此要捉他。他流亡出去了。到了北平，一面读书，一面斗争。后来到了上海，便在一个电影公司里工作。公司里欠了他的薪水，他不向他们要，说是由他们去，宁可没有衣服穿，向朋友去东拖一件，西拉一件的。“八一三”爆发，他和其余的那三个，便一起参加了别动队——

“提起别动队——妈的，可杀！”可中说。

我突然记起了力立的话了：“上了人家的大当，”紧接着问：

“怎么的？那是——”

“不要说它吧——队长叫我们是共产党，不如把我们去挡头阵，做日本的炮灰。第一夜走八十里，第二夜走一百里，把我们赶到火线上，呀呀呀呀，那许多飞机，那炸弹，有的人连枪都不会

拿——就这样平白的炸死了——”他的眼睛对我忽而放着奇异的光芒,但又立刻收敛,沉默了下去。

“真是,大的阴谋,——可杀!”一阵亢奋掠过他的眉毛,这在可中的脸上,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我想,人心竟有那样的狠毒的么?但可中误解了:文明迄今,它总有悲剧在,并非到了他才把他排进里面的。但我从此才了解,在可中的阴冷里,确包有一颗热烈的然而受伤的心脏。

一天,——是哪一天呢?我又记不确切了。总之,可中已经病倒,躺在比难民还坏的被窝里,发着很高的热度,呻吟着。我摸摸他的额头,热得灼手,问问他,他说不要紧的。可恶的就是我一天到晚钻在这令人烦厌的人事的纠葛里,难于摆脱,以致我知道他被送进难民医院的时候,他已晕厥过去有两次之多了。

第二天我连忙赶到医院里,他的唇中已被磕破,那显然是经过急救的。拿出体温牌来看,已经测过三四次,顶高时候有一百零四度,说是急性的肺炎,已经注射了四回。

心里,我非常之难过。真糟,可中生了这么沉重的病了。

但后来有人告诉我,可中的晕厥,是另有缘由的,说是他的勤奋遭了别人的忌——他在被窝里收到了匿名的信件,除了吓他包办收容所的教育工作外,还给他恶毒的辱骂。他一看,气得要命,热度本来很高,脸孔顿时发白,晕了过去——而且接连是两次!

“是这样的吗?……”我对于可中格外的不安,但也终于给我获得了那封匿名的信,一看,“真是这样的!”我想,有些人真如畜类的无知,他总辨不清楚他的对手是敌人还是朋友。我非常之愤恨。而且一面又想到难民医院中的那涂着口红的苗条的看护们,侧着头,切切嚓嚓,谈笑自如,将身旁的鸠形的病人尤其是可中视若无睹,让他们受着更多的病痛的煎熬。

最后是费了许多的周折,我把肺炎的可中弄到了一个设备较

好又较认真的伤兵医院去。

躺在伤兵医院里的可中的体温，逐渐下降，病势似乎好转了。我的心也比较的轻松些，然而他的胸部还只是痛，说话也不能用力气，声音也低到听不见，看他开口的时候实在很艰难。因此，那医院的院长对我很责备，说我无论如何不应该这样迟才把他送进医院来。

这，我承认这罪衍。

我所感到困苦的是我每次去看可中的时候，他总向我道谢，说我为他费了许多的心，尤其是换了好的医院。只要遇到他那病而发闪的感激的眼光时，便可怕的转过了头，朝着别处看，——但我又看见了我和可中的误解的过去了，那时，我曾在心里骂过他：“你有什么了不得呢？”……。

这，我也承认这罪衍。

又一次的去看他，但遭了守门的拒绝；说是杨可中开了刀，不能多讲话。“什么地方开了刀的呢？”我问守门的，——不答。我只好看不到他回转去了。

在回转的途中。我的心是沉重的。但只要仍然钻到那人事的纠葛里的时候，便会把什么都忘却，以致不去探问可中的病，已有四五天。

但这一回的去看他，守门的是准许了。一看可中的脸，神色依然。“开了刀吗？”我问他。——“开了的，臂膊上。”他低幽的说着，两只眼睛又对我突然发着晶亮的光芒了……。

恰巧有一个看护走进来，便问她，可中的臂上为什么要开刀？她说，是因为他在难民医院里打的针，那针眼发炎了的缘故。立刻，我的脑际闪过了那口红的苗条的猥琐的那些小东西。——

“哦！”我说，“原来！”